



中期评估当问计于民避免自说自话

王冷一

如今的上海,关于发展和民生领域的决策以及相关评估,越来越科学化和公开化了。如对于“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已经开始邀请第三方参与。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政府感觉“自我良好”和“自说自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集思广益。笔者日前就参加了徐汇区“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活动,徐汇区政协和上海社科院联合担任“第三方”角色。一番脑力激荡之后,感慨良多。笔者首先强烈地感到,以徐汇区为“麻雀”来解剖中心城区的民生瓶颈,很有典型意义。这个54平方公里的行政

区域,资源环境的承载压力与日俱增。该区人口已经超过100万,没有成为规划预想中的人口导出区域;且来此寻求发展机会的新上海人数量还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因为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交通等社会事业资源集中的优势,徐汇区还是名副其实的“上只角”;人户分离、人口集聚等择校、择居现象越发突出,同时任何规划的落实都相当艰难。但是如果不把落实规划目标作为“最低纲领”,那么,又如何实现社会公平呢?其次,笔者还明显地感知到公众民生诉求的表达正在

“水涨船高”。如在座谈中,就有一项未能完成预定指标的民生实事项目——公共体育场地。“民生”概念从寻寒问苦、救济扶贫,到公共体育、延年益寿,自然是社会进步、发展质量的里程碑。孩子要身体成长、年轻人要身心健康、中老年人要精神焕发,都离不开合理规范的体育锻炼。因此,该区“十二五”规划中的公共体育面积指标,是在中期也就是规划时间过半后增加25000平方米。然而,通过各种努力之后实际完成了80%,还差5000平方米。区政府向评估咨询专家、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解释

是:中心城区的空间资源实在有限而难以挖掘。第三,在更大范围的集思广益之前,否定或抛弃略有难度的规划中期目标是草率的。如在座谈会上涉及公共体育面积增加的课题时,有专家提议干脆修正或放弃这个指标。而笔者因为长期参与决策咨询和规划评估工作,深感再高明的专家也会有思维上的局限性。既然有关指标是项目规划前就征集过民意的民生诉求,为什么不能在遇到瓶颈时再放下身段去问计于民呢?离开学术化的评估会场之后,笔者也就公共体育话题去请教不同年龄段

的人,收获超过了预想。如一个孩子挺热情地告诉我:他们喜欢的攀岩和飞镖,公园里没有!孩子妈是数学老师,她认为现行公共体育面积的计算都是平面的,在寸土寸金地段大幅度地增加自然很难。而孩子和年轻人喜欢的攀岩、飞镖等新兴大众体育项目,已经是立体化了;也就是两边有效使用起来都可以算面积,而公园也增加了公益内涵。几位白领还反问我:公共体育不局限在陆地吧?滨江水域为什么不能开发呢?她们甚至建议伦敦奥运冠军徐莉佳以后退役,就应该去从事帆

船、皮划艇等水上运动的普及事业。一群老年人的建议也很有意思:慢步运动最需要合理规划。如在10多公里的徐汇滨江段,已经绿荫环绕的曲廊、长廊,就可以规划成老龄化公共体育的乐园。显然,这样的建议对于老龄化的上海是富有启迪的。在和他们热情、愉快的交流之间,笔者也自然找到了落实项目突破口的答案。由此看来:“规划项目的指标落实和瓶颈突破”,更需要走积极而广泛的群众路线。(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

“红头文件”卖香烟

凌河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而这个庄严的“红头文件”,无关发展宏旨,也不谈民生大计,竟是一道关于卖烟的“政令”——湖北省公安县下达《2013年烟草工作考核办法》,明确提出全县销售卷烟必须达到25100箱,共要卖掉6275万包,公安县只有105万人口啊,于是男女老少,包括怀抱里的婴儿,每人每年要抽掉60包香烟才行!“红头文件”切切此令,层层摊派卷烟销售,财政出钱设立“奖金”,县镇村干部全变成了“推销员”,为的是“落实文件”,为的是“令行禁止”。

其实这样的“红头文件”,并不只是公安一县才有,某市“自产烟”卖不出去,地方烟厂陷入窘境,于是市政府下达“红头文件”,各局各区各市企“公务用烟”一律不准买进外地烟,只准抽本地产烟;某县白酒销路不畅,酒厂向县委告急,于是“婆婆”也是下达“红头文件”,规定县属机关本县干部包括教师等等,每人要买多少瓶,以“保护民族工业”……就是这个公安县,早在四年之前,它就下达过“公务用烟”的“任务”,还用“查烟头”的办法来检查落实,早经媒体曝光,但仍旧习不改,这次又下了“红头文件”。

此类的“红头文件”,当然并不仅限于区区一支香烟。那年国庆之后,某县的群众,到政府机关办事,可是跑了几个局,均只有一人留守。公务员们到哪里去了呢?原来都到县内新建的“古城”游玩去了——这座“古城”,建好后没人去,形影相吊,不见人气,于是为了“扶助旅游开发”,县委县政府联署下达“红头文件”,要求本县千部职工去古城游玩,每人费用150元,均

由各单位报销,所以才有了这一出“空城计”。至于某地番茄大丰收,可是市场滞销,卖不出去,于是也是县委县政府下发“红头文件”,指令下属干部职工每人须买100斤番茄,以“救急”,以“托市”,等等,就更是司空见惯了。

“红头文件”的再三“下错”,并没有多少“猫腻”在,那全是一片好心,一腔“拳拳之心”,为的是“发展经济”,为的是“繁荣市场”,为的是“保护企业”,所以来“托”去“救”。只是“婆婆”当惯了,“奶妈”也当久了,所以习惯了,顺手就下个“红头文件”。我们的书记、县长们,忘记了政府在“市场”里究竟是什么角色?是规则的制定者,是球场边的“黑衣人”,绝不是亲自下场踢球射门的前锋、后卫、守门员呵!政府既不能下手“封杀市场”,也不能“下水”去“托”一企一商,更不能“下海”去推销叫卖,这正是现代市场经济乃至政治的一条定则呢。近年以来,我们常听说这样的“佳话”,某地大白菜大丰收,于是县长带队,到处去推销,某地萝卜卖不掉,于是县长“当街摆摊”,这样的新闻,值得高捧还是应当叹息,舆论之间,早已众说纷纭。至于一家公司上市、发股票,市长大人去站台,用公权力的信誉去“力挺”一家企业的信用,这屡见不鲜的事儿,本也值得辨析。到了用“红头文件”来卖烟,大概就是把事情推向极致,也把政府定位这个大问题,再次地放在了公众面前。

再过一个礼拜,就要开三中全会。我们即将开始的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据说一个重要主题是厘清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尤其是划清权力的边界。在这个时刻,再来议一议公安县的那个“一号文件”,应当不是无的放矢吧!

假新闻娱乐至死

徐达内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守护互联网生态的晴空》,宣布“经过网络的自我净化、治理者的善管善用后,今天中国的网络舆论生态,已经发生不小变化”:“以9月份数据为例,天涯社区BBS的社会民生类话题中,负面帖文总数下降63%,而天涯论坛帖文信息正面率小幅上升6%。”

这话我信。这几个月以来,事后被证明是谣言的传闻数量确有明显下降,以至于我这个专栏都有点“无米之炊”的危险。

不过,既然一惊一乍甚至无中生有的“民谣”减少了,“官谣”的问题也就更扎眼。特别是由正式媒体刊发的“假新闻”,虽然其中有一些用“谣言”来定义可能并不那么恰当,但是,确实很容易成为话柄,不仅很有可能抵消官方整治网络谣言的成效,还会严重损害专业新闻机构赖以生存的公信力。

“安徽马鞍山丈母娘婚宴上送400万元宾利轿车”就是一个例子。这条让无数“短腿穷”羡慕嫉妒恨的新闻,由南京金陵晚报10月4日首发,而后广获转载。不过,本地的皖江晚报、安徽商报在实地调查走访时,却发现,那条太白大道上的所有酒店都否认曾经举办过这场每桌5888元的豪宴,而且马鞍山本地人也均表示从未听闻此事。

更大的疑点还在于,那家南京媒体次日又发表跟进报道,声称婚宴上当时有单身男子在目睹“岳母赠宾利”后,站起来直指父母怒吼:“没有一百万!你们生我出来干吗!不是害我吗!”雷人狗血到这个地步,真是专业编剧也要自叹不如。

尽管金陵晚报那个以

这两篇报道成名的记者,据说一直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回应事件真伪,但是,种种证据都已表明,这个“岳母赠宾利”的故事,极有可能是从外地“移花接木”而来。记者应该是在马鞍山本地论坛上看到了一则讲述浙江豪华婚宴的帖子,或许因为一时疏忽误解,误以为事件是发生在马鞍山。至于次日报道的“男子咆哮父母”,则就完全是因为之前报道太受欢迎,导致记者宁愿编故事也要延续新闻的热度。

“老汉约女网友开房,见面却发现是儿媳”的新闻,因为首发媒体黑龙江晨报已经公开道歉,就可以更加确凿无疑地判定为假新闻了。因为没有跨省的问题,而且文中写明报警事宜,涉事的穆棱市公安局在报道面世次日即声明此案件是当地电视台记者韦洪基杜撰而成。

更加让人有些想不到的是,经过查证,这个韦记者还有个穆棱市文广新局外宣部副主任的职务身份,已经可以算是分管宣传的官员了。

细心的人们一定可以发现,从马鞍山“岳母赠宾利”到黑龙江“约儿媳开房”,这两个更像是来自火车站摊头小报上的假新闻,之所以会被正式媒体印成白纸黑字,都有一个共同的症结,那就是事实审核严重缺位,尤其是在预计“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后,刺激眼球的欲望压倒一切。比如前者,通篇依托的就是一个“论坛发帖的刘先生”,后者则是省会媒体全盘采信了基层通讯员来稿,尤其是当对方还拥有官方身份时。

娱乐至死的时代,要所有媒体都把“绝无虚言”当作宗旨,不现实,也没必要。但是,类似这种一戳就破的假新闻,还是少些好,否则会让人怀疑媒体的智商。

倘若没人愿意再做医生

李泓冰



陪家人去看病,深为医生折服。困扰数日的病痛,被医生以一个激光小手术,三下五除二解决,所有收费不足300元。因为是名院,门诊大厅里,挂号求诊的人水泄不通,脸上写满焦灼。到了中午,慢慢就寥落了,大部分人带着医嘱和药回家,心里也宁靖许多。

一定也会有医不好的病患,毕竟人类医学还没有进化到能治愈所有绝症的地步。一旦不治,亲友的悲痛可想而知,然而,其间却有一些人立即转身扑向医者兴师问罪,甚至酿成惨剧。更有甚者,病愈了还要怀疑医术有亏,竟起杀机。温岭被无端暴力袭杀的医生王云杰,就再一次把剑拔弩张的医患关系伤口,血淋淋地撕开在公众面前。

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医生护士们愤怒了。

牺牲者不独王云杰。据中国医师协会统计,短短10天内,发生了6起患者伤医事件,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的暴力伤医事件竟高达27次。而三级医院、大院、名院,更因诊疗量大、疑难险症多,成了医患关系高危区域。

事情严重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下笔批示了,要求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因医患矛盾引发的暴力事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维护医疗秩序。

据说,医院要高密度配安保了,有的医生在诊室配了辣椒水以防不测了,更多的医院将启用如机杨般的安检设施了……又有统计说,寒了心的医生们,有七成绝不愿儿女行医。而在世界范围,医生本来是社会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行业啊!

在医疗资源本就极其短缺的中国,如果真的没人愿意做医生,国人情何以堪?

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

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的中国严重到如此地步?仔细究诘,站在第一线的医生,是否在替欠账太多的医疗保障体系、替极其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替改革迟缓医药难分的医疗体制付出代价?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教育”和“医疗”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教育总算是完成承诺了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但医疗卫生的政府财政投入还是一个长期低迷的指标。2011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1.35%,低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尽管中国在努力弥补,但差距之大仍然惊心。

总体投入偏低,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严重失衡导致患者奔波千里求医,医药不分家带来“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种种和百姓生活的渐渐丰裕体面形成强烈反差。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步步艰难。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医者,对13亿人而言,是接触最多、依赖最深、受益最大的职业之一。他们兢兢业业支撑着13亿人的健康,拿着不高的工资,“白加黑”连轴转,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承受着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和间接的身心伤害。

倘医生和患者长期对立,必会两败俱伤。要根治,需要国家下决心动大手术。否则,真的没人敢做医生、或最优秀的人不愿做医生的话,最倒霉的还是患者,是你、我、他……